

编者按: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中国日益步入少子化社会和老龄化社会,继续实施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消减。《证券时报》约请几位专栏作者,或直面现实,或钩沉历史,对计划生育这个话题进行探讨,以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IC/供图

人口形势严峻 改变生育政策迫在眉睫

洪新星

近来,专家学者对我国人口现状和趋势做了深入研究,新闻媒体对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报道,全面二胎放开的呼声越来越高,背后反映的是公众对人口现状担忧和提倡生育政策调整的诉求。经过30多年计划生育,我国的人口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生育率逐渐下降下,出现少子化、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表明我国人口优势已经不再,人口劣势却在逐渐增加。

统计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少子化社会,0~14岁人口的比重已经低于18%。从1982年开始至今,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已经从33.59%下滑到2013年16.4%,其中2010年第一次低于18%,正式进入少子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提升,0~14岁人口比例将低于10%,比“超少子化”11%的水平还要低。日本是最早进入超少子化的国家,之后是近20年的经济调整,与超少子化不无关系。少子化使得后继无人,对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劳动力占比已经出现拐点,人口红利消失。2011年15~64岁劳动人口比重为74.4%,相对2010年占比减少0.1个百分点,从国家统计局数据看2011至2014年劳动力人口比重一直是下滑的,加上少子化现象的出现,未来劳动力人口无论比重还是数量都会继续下降;这种现象的出现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且在继续加重,较为明显的是2011年开始在我国沿海制造业发达地区出现用工荒,以及大量制造业海外转移。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形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可能进入老龄社会。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比重为7.1%,超过7%老龄化警戒线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3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比重已经达到9.7%,因为出生人口比例的下降,将会使得我国老龄化更加严重。我国老龄人口增加快于世界水平,出现未富先衰;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养老、医疗、生活等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我国人口结构严重畸形,男女比例失衡、家庭结构失衡、城内外失

衡。从2012年我国0~14岁人口男女比例来看已经接近120:100,意味等这些人成年,中国将会至少20%男性打光棍。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后的生育率水平下降,导致我国出现大量的4:2:1或者4:2:2家庭,家庭金字塔的稳定性让人堪忧。随着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农村出现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为主的人口特点,导致出现不少民生问题,最严重莫过于毕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另一面是城市的繁华,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人口,灯红酒绿,城内外两重天。

无论是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还是少子化、人口红利消失现状,背后原因是我国生育率水平的下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传统观念下出生性别选择结果。目前,我国总生育率水平处于低位,且已经低于正常人口更替水平;我国已经接近人口下滑的日本和俄罗斯生育率水平,我国2006年综合生育率为1.4,已经低于更低水平2.1,意味若干年后人口的出生无法弥补死亡的下降,导致人口下降。形成我国人口现状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生育;婚姻观念的改变,晚婚晚育,甚至丁克;为了保证自

身舒适的生活,大家已经不愿意多生小孩;育儿机会成本提高,工作与育儿难以两全;避孕技术提高,怀孕得到有效控制;堕胎技术的提高,可以帮助减少生育等等,其实已经从政策降低生育率水平到了大家主动不愿意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后,生育率的下降,世界上发达国家概莫如此,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生育率都较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叠加是导致我国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当务之急能做的就是全面放开二胎,缓解生育率下降,因为不放开,未来的人口压力将会使得国家难以负重,即使放开也不会改变低生育率的趋势,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外的其它原因很难去去除。虽然有些人担心全面放开二胎会出现人口爆发,从我们了解的数据看,爆发可能性极小,即使有也是小规模 and 短暂的,因为挤压的生育意愿会在3~5年内释放形成短暂的小高峰,之后会恢复平静。全面放开二胎不会出现人口爆发的原因有:第一、单独二胎放开作用有限,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开单独二

胎以来,截至今年5月份,申请单独二胎仅有145万,占具备资格人群的13%,相当于我国每年出生1600万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10%不到,影响极其有限,也无法弥补老龄化带来的缺口;即使有些没有立即申请,但是累计的二胎生育意愿也不会很高。第二、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并不会长期改善我国生育率较低的水平;北京大学人口学者乔晓春认为,全面二胎并不会像此前有关部门担心的那样会带来每年数千万的人口增量,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估计最高只有600万~700万,加上目前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年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万左右,峰值总和生育率也只有2.2~2.3。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如此水平的总和生育率预计只会持续短短几年,很快就会一路走低,一直低到目前1.5左右的水平;有些人认为放开后农村会出现大量的生育,事实上农村观念已经转变,据对农村的观察,基本没有生育三胎,以二胎为主、一胎为辅,有些拥有二胎指标的已经不愿意生育二胎,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研究院研究员)

增加人口数量并不是中国经济的特效药

陈嘉禾

从人口替代率的角度来说,一对夫妻平均生育2.1到2.2个孩子,才能保证人口的数量和年龄分布保持正常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疑当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并对经济带来压力。

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并不简单是一个政策的问题。目前,尽管我国的两胎政策有所放开,但是符合条件的家庭真正生育二胎的并不多,许多评论即将此归结于政策尺度不够带来的结果,似乎只要政策足够生育率就会上升,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必然面对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在李光耀所著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李光耀明确提到了对新加坡人口问题的担忧,指出尽管政府加大对生育子女的补贴(而不是中国目前

实行的限制),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很难提高。新加坡人并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愿意生育子女,这关乎个人一辈子的生活选择问题,而不仅仅是社会补贴所提供的金钱所能左右的。

他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来自多方面,社会分工的细致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沟通减少、社会功能完善导致对子女依赖的减少、个人娱乐的丰富导致的家庭凝聚力下降等因素,都造成了新加坡的生育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只有通过不断引进年轻的海外移民,才能够缓解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新加坡,目前全球的发达经济体大多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现象,造成老龄化日趋严重。能够通过移民缓解此一问题的国家,如美国,则对其后果感觉尚不明显,但如日本等单一民族国家,则饱受老龄化困扰。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化,在许多层面上人

们的生活被改变了,而这种改变会带来生育率不可逆转的下滑。尽管社会政策的制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小下滑的速度,但是把生育率的降低完全归咎于社会政策、期望通过制定完美的政策就能彻底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无疑是切实际的。

当一个公民发现自己年轻时可以选择除了生儿育女以外的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时,当社会的观念变得越来越开放、不再以是否生儿育女、尤其是中国传统传统的生儿子为人生成功的象征时,当一个中年人发现自己年老之后可以依靠养老金、医疗保障、而不是只能依靠子女生活时,当人们工作内容越来越细分化、专业化,导致和异性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时,社会的生育率必然会下降。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限制式的生育政策,还是新加坡鼓励式的生育政策,其都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结果,

即越是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区域,其生育率反而越高。

在限制式政策下,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监管力度会相对较弱,导致生育率增加。在鼓励式政策下,则发展水平更低的区域对财政刺激的敏感度更高,因此也会导致生育率增加得更快。由于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和人口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而此两种政策都会导致整体社会的教育水平有所下降,而这却是人口控制政策始料未及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使中国的人口政策能够顺利地增加生育率、解决老龄化问题,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膨胀。由于中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任何试图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人口政策都会带来已经有13亿多的族群进一步扩大,而过多的人口会导致中国陷入经济发展的致命

陷阱:没有足够的资源。

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繁荣,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因此即使是将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发展到如希腊、意大利的发展水平,也将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消耗,而这与中国当前自然资源匮乏的现状是冲突的。在试图用更多的年轻人解决老龄化问题时,我们一定要思考如何解决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资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

总结来说,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工程,并不是简单的“放开政策、刺激生育”就可大功告成。也许,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简单的调整人口结构,在合理化教育以增加单位劳动力生产力、理顺市场和法制机制以减少浪费和重复建设、拓展老龄人群就业范围以避免人才浪费等方面,我们还有更多事情要做。(作者系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生育

王国华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人口统计数字出现在公元2年(西汉平帝年间),当时全国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八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明朝达到两亿,民国时应该是四亿(那时常有四万万同胞齐努力之说),上世纪50年代初统计数字为六亿左右。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1900年,人口一直是缓慢增长。由于战乱频仍,瘟疫时发,生产力低下,人口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有了人,才能创造大量财富。反过来,人口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人数上去了,证明生产能力提升了。因此当政者是多么希望人口增加啊。

所以,我国历史上的计生政策都

是鼓励生育的,虽然清朝人洪亮吉在《意言·治平篇》中提出过要重视人口过剩问题,但基本属于边缘言论乃至被视为哗众取宠,从没被讨论过,采纳过。

古代当政者的计生措施具体如下:

鼓励早婚,限制、惩处晚婚。早婚在我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孔子家语》中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古代环境恶劣,长寿者少,人到七十古来稀,相应地成熟也早,男性十六岁,女性十四岁,都可以算作成年人(古代计算年龄多按虚岁,若按周岁算就更小了),要尽早结婚,承担家庭责任。

早在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就规定男子二十岁娶,女子十五岁嫁。到宋仁宗时期,规定男子十五岁娶,女子

十三岁嫁;明朝是男子十六岁娶,女子十四岁嫁(改),年龄都在十多岁。如果不按时嫁娶怎么办呢?《宋书·周朗传》中说,“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女子十五岁没有嫁出去,家人有罪,应该连坐。够狠吧?司马炎更绝,《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下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到时不嫁,地方官有权拉郎配,随便找个剩男嫁过去。西汉惠帝时则采取经济制裁法,女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而不婚的,按五倍征收算赋(人头税),什么时候嫁出去才算完。结婚早则生育早,生育早则人口更新快,早婚对多生的效果显而易见。

禁止溺婴。古代溺杀婴儿的现象并不鲜见,尤其福建浙江一带。原因比较复杂,比如,担心赔嫁妆,溺杀女婴;

害怕多子分家,溺杀男婴;赋税严重,养不起;生下的是残疾婴儿,不想承担抚养责任等。总之大多因为穷困。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自发调节人口结构的一种方式,尽管残酷。好在政府对此行为是禁止的。《宋史》中记载: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杜杞“知建阳县,闾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保住孩子诚然是出于人道主义,但客观上是保住了社会资源。

鼓励再婚。我国古代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夫”的说法,貌似推崇从一而终。但实际上,民间的再婚不受什么约束,甚至受到鼓励。传统文化中颇有一些类似口是心非的理念。更重要的是,皇室女儿屡屡再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寿,曹寿去世后,改嫁夏侯婴,夏侯婴

死后,又改嫁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广,赵广死后,又嫁高阳侯薛宣。有人统计,唐代一共有210位公主,结过婚的130位,这中间只嫁一次的有100人,再婚“二嫁”的有27人,“三嫁”的有3人。皇家的示范效应比多少宣传推广都有效,所谓上行下效。而寡妇再嫁,符合人性,亦能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生育率。

此外,各朝各代在安置流亡人口也多有努力。此行为虽不能直接增加人口,但生活状况改善后,人口肯定会增长。

想来,繁衍应该是人类生而自由的一部分,但被当作生产力的一部分进行配置古已有之,只是如何配置需要智慧与同理心。(作者系深圳作家)



【思想星火】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当务之急能做的就是全面放开二胎,缓解生育率下降。



【明远之道】

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工程,并不是简单的“放开政策、刺激生育”就可大功告成。



【经济钩沉】

繁衍应该是人类生而自由的一部分,但被当作生产力的一部分进行配置古已有之。